

新 传 统 主 义

郑家栋 主编

台湾儒学的 当代课题： 本土性与现代性

陈昭瑛 著



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传统主义丛书

台湾儒学的当代课题： 本土性和现代性

陈昭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儒学的当代课题：本土性和现代化/陈昭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7
(新传统主义丛书/郑家栋主编)

ISBN 7-5004-2994-0

I . 台… II . 陈… III . ①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台湾省-现代②文化-研究-台湾省-现代 IV . 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7376 号

责任编辑 冯春凤
责任校对 尹 力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插 页 2
印 张 6.625 印 数 1—2000 册
字 数 150 千字
定 价 1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一 儒学在台湾的移植与发展：从明郑至日据时代	(1)
前言	(1)
一 明郑台湾与儒学.....	(3)
二 清初朱子学的复兴与台湾儒学教育的建制.....	(8)
三 清初台湾教育碑文中的儒家思想.....	(14)
四 清代台湾书院学规中的儒家思想.....	(20)
五 清代台湾的儒学诗.....	(23)
六 殖民地的台湾儒学：1895—1945	(27)
二 《台湾通史·吴凤列传》中的儒家思想	(34)
一 连雅堂的时代与家学.....	(34)
二 《台湾通史》中的汉族意识与原住民形象.....	(35)
三 吴凤故事的各种版本与雅堂立传的准则.....	(43)
四 “仁、义、智、武”的儒家思想及其文学性的表现.....	(50)
三 启蒙、解放与传统：论 20 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省思	(57)
前言	(57)
一、1921 年的台湾：启蒙	(58)
二、1924 年到 1925 年的新文学运动：	

从“启蒙”到“解放”的过渡.....	(68)
三、1927年的台湾：解放	(74)
四、“传统”的再现	(81)
(一) 基本立场：文化调和论	(82)
(二) 自我定位：从“士”到“知识阶级” 的转化	(89)
(三) 对儒家诗学的回归	(96)
(四) 对儒家民本思想的吸收	(99)
五、发现一个典型：王敏川.....	(104)
(一) 从启蒙人物到左翼运动领袖	(105)
(二) 儒家思想的体证者	(108)
(三) 女性主义者	(119)
四 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中的儒学思想.....	(124)
前言	(124)
一、吴浊流的汉学生涯.....	(125)
二、胡太明的启蒙导师：彭秀才和胡老人	(130)
三、胡太明生命中的两个儒学空间： 云梯书院和胡家大厅	(134)
四、由道入儒：胡太明的心路历程.....	(139)
五 当代儒学与台湾本土化运动.....	(145)
一、前言：儒学与当代台湾	(145)
二、台独的反中国文化论与弑父情结	(152)
三、当代儒学的本土主义	(156)
四、日据时期本土化运动中的儒学	(159)
五、徐复观与台湾本土化运动	(167)
六、唐君毅和台湾原住民运动	(176)

七、结语：从花果飘零到落地生根.....	(182)
六 一个时代的开始：激进的儒家徐复观先生	
——纪念徐复观先生逝世七周年.....	(193)
一、从大地的儿子到激进的儒家.....	(194)
二、复观之学的特色：辨证的、实践的、历史的.....	(198)
三、从解放“儒学”到“解放儒学”.....	(203)

一 儒学在台湾的移植与发展： 从明郑至日据时代

前　　言

儒学在明郑时期传入台湾。明郑历史乃南明史的一部分，主导明郑历史的郑成功也与南明的儒学有深厚的渊源。因此明郑时期的台湾儒学，虽刚萌芽，却是上承南明诸儒，下启清代台湾儒学。台湾儒学的另一来源是福建朱子学，广义言之，即闽学。闽、台仅一衣带水之隔，荷据时代台湾之汉移民以闽人为主，明郑之时自郑成功以迄下属亦多闽人。清代台湾在 1885 年建省之前，也一直是福建辖区。因此，闽学传入台湾乃顺理成章的事。

就汉族观点而言，清代乃是台湾社会成为以汉人主导、以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阶段，于是以台南一带为中心，儒学随着汉文化而向南、向北、最后向东扩散。就文化的阶级因素而言，郑成功来台之前，庶民阶级的汉文化早已随汉移民进入台湾，其中自不乏与儒学相关而表现于人伦日用之间的思想。不过，属于士大夫阶层的汉文化，如儒学与科名观念、精细文学与书画创作，则在明郑之后才传入台湾。明郑统治台湾仅 22 年，清廷则领台 212 年。在这 200 多年间，由于汉移民的增加、有心官民的大力提倡、科举功名的吸引，

儒学教育日渐普及。因此，在马关条约割台之时（1895），台湾已是处处弦歌，难怪乎领导农民反抗日本部队登陆的多为各地儒生，其情其景颇类似南明抗清、慷慨牺牲的儒生。儒学在日据时代亦如南明儒学，充满民族抗争的色彩。所不同者，日据时代同时是台湾与亚洲地区一起面对现代化挑战的开端，新旧文化的论辩折冲亦发生于日据时代的知识分子阶层。但或许是由于处于殖民地，台湾汉人在日本人同化政策的压力之下，反而对本族文化的存亡有较强烈的危机感，因此并未出现全盘西化的理论。结果造成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20世纪上半叶，台湾是全中国最现代化的地区，但也是维护旧文化最有力的地区^①。似乎这样一个基调一直持续到20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

就明、清两代而言，台湾儒学由于发展时间短浅，又未能超越闽学的笼罩，并未成为具有原创性的学派，因此所谓“台湾儒学”只能说是闽学在台的一个支脉，或指儒学在台湾的存在、发展。虽然如此，台湾儒学仍有一些特殊于内地的因素，值得深入观察。就闽、台的渊源而言，许多执教于台湾的官学、书院的教师，甚至学有专精的行政首长本身即来自福建，自然而然将闽学传入台湾，其中值得注意的人物有陈瑊与蓝鼎元。蓝氏在高令印、陈其芳合著的《福建朱子学》中有专文介绍（见高令印等406—424）。另外，虽未入台，但曾受邀为台湾诸罗县庙学撰写碑记，并有多篇文章收在台湾地方志的闽学人物是蔡世远。蔡氏曾主持福建朱子学重镇鳌峰书院，有多部理学著作问世，在高令印、陈其

^① 台湾的现代化其实始于19世纪下半叶来台的沈葆桢和刘铭传，刘氏贡献尤大。日人在台的现代化建设自然要深入而全面得多，但其目的在于使台湾成为南进基地。时下学者每论现代化，常津津乐道日人的建设，有意抹杀刘铭传，甚至掩饰日本真正企图，殊为不当。

芳的《福建朱子学》中也和蓝鼎元一样，被归类为清初朱子学复兴的代表人物（高令印等 397—405）。因此，就研究素材而言，蓝鼎元和蔡世远的著作可以视为闽、台儒学渊源的重要材料。

清初大力建设台湾府学、提倡儒学教育不遗余力的陈瑩并不是成一家之言的儒者，但他留下的数篇教育碑文所表现的儒学思想相当深刻，值得分析探讨。陈瑩之外，台湾各地的教育碑文作者中虽然缺乏硕学鸿儒，但碑文本身却反映一时一地的儒学教育的现象，以及某些层面的儒学思想。碑文之外，书院的学规也是考察当时儒学思想的材料。此外，历代台湾各地之地方志中也收有儒学师生少数理学论文和相当数量的理学诗，也是思想史的材料，值得注意。地方志的作者若为留意思想者，也常在记载教育制度、现况的篇章中夹议夹论，借地方志的书写来抒发个人的儒学思想。对这些类似传注的见解，也不应忽略。

儒学在台湾的特殊经验约有二端：一是台湾原为原住民居住之地，对汉人而言为普世性教育的儒学教育，对非汉族的原住民而言，其实是汉化教育。儒学与异文化的遭遇是台湾儒学非常特殊的经验。其二，明、清之际，儒学虽以强势文化的地位渗透于原住民社会，但在日据时代，则沦为弱势文化，一方面受到大和民族之强势文化的压制，一方面也和大陆的旧学一样，遭遇新文化的猛烈冲击。处在民族压迫下的儒学，除了与新学相调和之外，也有回到明郑经世学风的趋势。栎社诗人以及王松、洪弃生、连横等人的诗学，意在继承儒家社会写实的诗论。连横的史学，因写于殖民地的台湾，更是把儒家的春秋学发挥到了极致。

一、明郑台湾与儒学

明郑与儒学的关系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观察：一是郑成功本人

与儒学的关系，二是南明诸儒与台湾的关系，三是明郑在台湾的文教建设。就第一点而言，郑成功（1624—1662）于7岁时被父亲自日本接回中国之后，便开始接受儒学教育。史书记载他“性喜春秋，兼爱孙吴。制艺之外，则舞剑驰射；楚楚章句，特余事耳。”（江日升39）在11岁时曾以“洒扫应对”为题，得如是奇句：“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也”应对。当时先生惊其新意。（江日升39）由这些地方可以看出郑成功属于儒学中的经世派。我们更可以相信，他年少时对《春秋》的喜好深入骨髓，后来成为他抵死抗清的思想基础。

郑成功在15岁时（崇祯11年，1638年）“进南安学弟子员”（江日升42）。崇祯15年（1642），19岁时赴福建省乡试（江日升48）。^① 郑成功的儒生身份使他在1644年清军入关（史称甲申国变）后，和许多儒生一样有哭孔庙、焚儒服的仪式化动作^②。最早记载见郑亦邹的《郑成功传》，称郑成功对父亲降清“既力谏不从，又痛母死非命，乃慷慨悲歌，谋起师。携所着儒巾襕衫，赴文庙焚之。四拜先师，仰天曰：‘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谨谢儒服，唯先师昭鉴之。’高揖而去。祃旗弁族，声泪俱并。”（诸家：《郑成功传》5）甲申国变对儒生阶层是一种洗礼，也是一种锤炼。孔庙成为儒生集体或个别抗争行动的出发地点，孔子成为儒生表明心迹或宣读“卷堂文”（类似罢课宣言）的对象。这里显示了孔庙在教学、祭祀以外的另一种功能。

明郑与南明诸儒的关系，从台湾延平郡王祠从祀名单中可以

① 有关郑成功的儒生生涯，参看陈昭瑛1993。

② 在清兵入关、北方沦陷之后，哭孔庙、焚儒服在南方儒生阶层中是十分普遍的仪式化行为。儒生阶层因尚无官职可守，哭庙、焚儒服是为了表示抗议，及永不出仕的决心。参考陈国栋。

见出，从祀者中有曾櫻、徐孚远、王忠孝、沈光文、辜朝荐、沈佺期、陈永华等人。^① 曾櫻是东林党人。^② 徐孚远，字暗公，浙江华亭人，崇祯初年与同邑陈子龙合创几社，意在“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③ 几社在全盛时期，会艺之人超过百人（盛成 199）。徐、陈二子曾共成《皇明经世文编》508 卷，又改编并刊行徐光启《农政全书》60 卷（盛成 199—200）。几社虽发于以文会友，但其思想的经世色彩非常明显。有关于徐孚远与郑成功的关系，全祖望在《徐都御史传》提及徐氏从鲁王入闽，“时岛上诸军尽隶延平，衣冠之避地者亦多。延平之少也，以肄业入南监，尝欲学诗于公。及暗公至，亲迎之。公以忠义为砥厉，延平听之，娓娓竟夕。凡有大事，谘而后行。”（诸家：《徐暗公先生年谱》68）可见郑成功以师事徐孚远。徐孚远后来从郑成功来台湾。

几社后来与其他社团合组复社。^④ 复社以张溥为首，张氏特重经学，他批评当世“诗书之道亏，而廉耻之途塞也”，并言：“庶几尊遗经，砭俗学，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党乎！”（吴伟业 33）复社成立时，张溥立规条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能泽民。……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陆世仪 54）可见复社既主尊经，也重经世。复社社

107853

① 延平郡王祠从祀者名单见连横：《台湾通史，诸臣列传》，1985：704。

② 曾櫻名列“东林党人榜”（三百零九人），此榜附录于王天有 114—115。曾櫻为江西人，进士。隆武帝亡，依郑成功。永历 5（1651）年，清军趁郑成功率军南下勤王，袭击厦门，守将郑芝莞弃城，岛中大乱，曾櫻恐为清军所执，自缢（见江日升 116—117）。

③ 见杜登春：《社事本末》，转引自盛成 197。

④ 陆世仪记载：“是时江北匡社、中洲端社、松江几社……各分坛坫，天如（张溥）乃合诸社为一……因名曰复社。”（陆世仪 54）。

员最多达 2255 人（盛成 198），社员遍及全国，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贵州皆有社员（见陆世仪 63—64）。

上述从祀延平郡王祠的沈光文则比郑成功早 10 年入台（1652）。沈氏为台湾文学鼻祖，^①出于明末儒家黄道周门下。黄道周亦列名“东林党人榜”，并且是复社重要人物。沈氏在台曾以教导原住民汉文及行医谋生（连横，1985：714）。复社与几社富于实学精神，不仅沈光文在台行医，上述从祀者中属于“海外几社六子”^② 的沈佺期也在台湾“以医药济人”（连横 1985：718）。

从祀者中最能实践南明实学精神，以贡献于台湾各方面建设的，自然非陈永华莫属。陈永华父亲为陈鼎，是同安县教谕。初同安县沦陷，后为郑成功光复，当时陈鼎即“传告诸生，起义勤王”（江日升 106）。后来清军再犯，陈鼎与知县叶翼云死守同安，城破被擒，不屈被杀（江日升 107）。陈永华曾入厦门储贤馆就读，受教于曾櫻和徐孚远（盛成 208）。后经兵部侍郎王忠孝（亦在从祀之列）推荐，郑成功接见，“与谈时事，终日不倦。大喜曰：‘复甫〈陈永华字〉，今之卧龙也。’”（连横 1985：722）郑成功逝世后，陈永华辅佐郑经治理台湾。陈永华治台分两方面：一是民生，一是文教。民生方面，他“亲历南、北二路各社，劝诸镇开垦；栽种五谷，蓄积粮糗；插蔗煮糖，广备兴贩。……又设立围栅，严禁赌博。教匠取土烧瓦，往山伐木斩竹，起盖庐舍，与民

^① 有关沈光文生平与诗作介绍分析，见陈昭瑛 1993：40—41；陈昭瑛 1996（a）：第 10—18 页。

^② “海外几社六子”为徐孚远、沈佺期、张煌言、卢若腾、曹从龙、陈士京（见连横 1960：11）。其中张煌言是抗清名士，曾与郑成功联军北伐，最后殉国。卢若腾也领导过武装抗清，随郑军入台，病逝于澎湖；关于其诗作分析，可参考陈昭瑛 1993：42；陈昭瑛 1996（a）：22—26。

休息。以煎盐苦涩难堪，就濑口地方，修筑坯埕，泼海水为卤，暴晒作盐。”（江日升 235）前辈学者盛成非常敏锐地指出，观陈永华上述作为，“似曾熟读《农政全书》与《天工开物》及《皇明经世文编》者然。”（盛成 217）陈永华通过父亲陈鼎与前辈徐孚远等人的教导，吸收晚明实学思想原是顺理成章的。

文教方面，陈永华启奏郑经：“开辟业已就绪，屯垦略有成法，当速建圣庙，立学校。”起初郑经还以为“荒服新创”、“人民稀少”为由推托（江日升 236）。陈永华乃再晓以大义：

昔成汤以百里而王，文王以七十里而兴，岂关地方广阔？实在国君好贤，能求人才以相佐理耳。今台湾沃野数千里，远滨海外，且其俗醇；使国君能举贤以助理，则十年生长，十年教养，十年成聚，三十年真可与中原相甲乙。何愁局促稀少哉？今既足食，则当教之。使逸居无教，何异禽兽？须择地建立圣庙，设学校，以收人才。庶国有贤士，邦本自固，而世运日昌矣。（江日升 236）

于是郑经大悦，允陈永华所请。第二年（1666），先师圣庙成，旁置明伦堂，并立考试制度（江日升 236）。同时“各社会设学校延师，令子弟读书。”（出处同上）可见对原住民的汉化教育也始于陈永华，^①当时庙学的国子监助教由叶亨担任（江日升 236）。叶氏也是厦门储贤馆生员，受教于徐孚远，著有《五经讲义》行世（盛成 216）。在叶氏教导之下，庙学诸生深造有得，在清廷领台之后纷纷高中，并精通经学，如陈永华子陈梦球康熙 33 年（1694）

^① 沈光文亦曾在罗汉门山外目加溜湾教原住民（连横 1985：715），然局限一地。

中进士，习《易经》，王忠孝之侄王璋于康熙 32 年（1693）中举，也习《易经》（高拱乾 207—208）。其余中举者尚有苏峨、王锡祺、许宗岱、杨阿捷等习《易经》，王茂立与陈圣彪习《诗经》，邑星灿习《春秋》（周元文 206）。可见叶亨执教台湾第一座庙学时，以《易经》的传授最有成效。可惜尚未见这些学生有论《易经》之文传世。

自孔庙建成到郑氏降清（1666—1683）才 17 年，但教化成果卓著，此不仅见于康熙年间高拱乾、周元文所修《台湾府志》的“进士年表”、“举人年表”、“贡生年表”中浩浩荡荡的名单，也有其他资料可以佐证。康熙 25 年（1686）上任的第一任台厦道周昌在《详请开科考试文》中言：“本道自履任后，窃见伪进生员犹勤藜火，后秀子弟亦乐弦诵。”（高拱乾 235）可见明郑教化之功昭显，已培养许多可以应考的儒生，周昌才会在甫上任即请求开科考试。康熙 39 年（1700）来台的郁永河在其《裨海纪游》中记录其友人顾君之言：“新港、嘉溜湾、欧王、麻豆，于伪郑时为四大社，令其子弟能就乡塾读书者，蠲其徭役，以渐化之。”这一段也点出了明郑时期原住民教育的结果。

从现存有限的资料看来，明郑时代儒学以经学、经世之学为主，这与晚明、南明的时代精神有关，朝政败坏、国族危亡的现实因素一扫空谈心性的学风。但清廷领台之后，海内一统，政治渐上轨道，理学开始有复兴的迹象。

二、清初朱子学的复兴与台湾儒学教育的建制

康熙皇帝是朱熹的崇拜者，他自谓 8 岁起就精心研读朱注《大学》、《中庸》，在《朱子全书·序》中自称：“读书五十载，只

认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并称许“朱子注释，阐发道理，没有一字一句不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康熙并升朱子祀于孔门十哲之列。由于康熙对朱子“最为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为准绳”（参见清高宗乾隆 6 年上谕），一时朱子学大兴，学者遍及全国。^①

福建是闽学重镇，根基深厚，自然不会在这场复兴运动中缺席。清代台湾教育所以特别重视朱子，必须从这一发展趋势来理解。乾隆初年刘良璧修纂的《重修台湾府志》与其他台湾地方志在体例上略有不同，即设有“卷首：圣谟”，其中收有康熙 51 年（1712）《谕表章朱子》，文中言道：“惟宋之朱子，注明经史，阐发载籍之理，凡所撰释之文字，皆明确有据，而得中正之理。今五百余年，其一句一字莫有论其可更正者。观此，则孔、孟之后，朱子可谓有益于斯文，厥功伟矣！”（刘良璧 10）后来在《御制周易折中序》、《御制春秋传说汇纂序》、《御制诗经传说汇纂序》（刘良璧 11—22）等文，康熙仍一再推崇朱熹。

另一个影响全国（包括台湾）的文件是顺治 9 年（1652）颁行于各省、府、州、县之儒学明伦堂的卧碑文。台湾在 1683 年为清廷统治之后，各地儒学也立起这一全国统一的校训，其中有相当浓厚的“以政治干预学术”的意味，如文中规定：

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

^① 上述清初朱子学复兴一段，参考高令印等 362—373。

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刘良璧 1）

从这卧碑文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清廷记取了入关后遭遇儒生阶层顽强反抗的惨痛教训。晚明、南明的抗清以知识分子的结社为据点，因此清廷禁止士人“立盟结社”。又因为言论可以耸动天下，因此竟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军民利病，也不许刊刻文字。清廷借教育以培养顺民的居心非常明显。连横在《台湾通史·教育志》对此曾痛加批评：“夫国家养士，所以培元气也。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天下视为指归。宋诸生伏阙挝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唯此相近。今乃并国家大事而不许言，则诸生读书奚用哉？”清廷虽鼓励兴学，然而“文字之狱，捕戮无遗。其所以钤制士类，玩弄贤才，焚书坑儒，犹未若斯之甚也。”（连横 1985：266—267）连横所言甚是，然他写作《台湾通史》的年代已是民国，可以毫无顾忌地批评清廷。但清初的部分知识分子抱着亡国家不亡天下的一线希望，借力使力，试图延续斯文于异族统治之下，其热心文教的推广，不宜单纯视为附和清廷。因此在洞悉清廷文教政策的背后动机之余，也不可忽略推动文教的士人之一片苦心。

清廷初领台湾之时设一府三县，即台湾府，下辖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府设府儒学，县设县儒学。所以康熙年间台湾共有四座学宫。到清廷割台，台湾各地共设有 13 所儒学，如下表：

其中有七所是设于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一方面显示清廷在台权力的扩张，一方面也显示列强的觊觎加深清廷对台湾的重视。府学、县学是地方最高学校，皆设有孔庙大成殿、明伦堂、泮池等设施，并从祀诸儒与文昌帝君，一仍大陆体制。

清代台湾儒学一览表

儒学名称	创建年代	附注
安平县儒学	康熙 23 (1684) 年	原为台湾县儒学
凤山县儒学	康熙 23 (1684) 年	
台南府儒学	康熙 24 (1685) 年	原为台湾府儒学
嘉义县儒学	康熙 25 (1686) 年	原为诸罗县儒学
彰化县儒学	雍正 4 (1726) 年	
新竹县儒学	嘉庆 22 (1815) 年	原为淡水厅儒学
宜兰县儒学	光绪 2 (1876) 年	
恒春县儒学	光绪 3 (1877) 年	
淡水县儒学	光绪 5 (1879) 年	
台北府儒学	光绪 6 (1880) 年	
台湾府儒学	光绪 15 (1889) 年	
苗栗县儒学	光绪 15 (1889) 年	
云林县儒学	光绪 16 (1890) 年	

(见《台湾省通志》卷五《教育志·制度沿革篇》，页 13)

府县儒学之外，官办或民办的书院规模小，灵活性大，所以相当普遍，二百年间至少设了 45 所（参考黄秀政 129—135）。书院按等级不得祭孔，多祭宋儒与文昌，然其兼重教学与祭祀则与府县儒学相同。书院之下尚有分布各村落与原住民部落的小型学校，称为社学、义学或义塾（书院若非官办，有时也称为义学）。以凤山县为例，到光绪 20 年（1894），各地社学（包括番社学与民社学）已超过二百多个（参考陈昭瑛 1996 (c)）。可见到割台前夕，教授汉文与儒学初级经典的小学校已遍布全台。